

# 考量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逻辑的三个维度<sup>\*</sup>

徐艳玲 王 敏

**【内容提要】**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理想在中国场域的现实形态。就其生成而言，它隶属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现实的人”的生活理想理论，其理论维度的生成呈现出从个体化美好生活追求到体系化美好生活思想构建、再到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的学理脉络；它承续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进行的历史性变革实践，其历史维度的生成呈现出从物质基础相对匮乏条件下人民精神生活中信仰要素的激励作用明显、到物质生活丰裕基础上人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再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前提下拓展人民生活新样态的逻辑理路；它彰显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持续提升的新要求中，其现实维度的生成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对其初心使命的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现实层面与理想层面张力的保持、历史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相统一的现实进路。

**【关键词】**美好生活 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 唯物史观

**作者简介：**徐艳玲（1966-），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100）；王敏（1991-），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山东济南 250100）。

美好生活最初是作为大众话语存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将人民美好生活纳入自身的执政目标。人民美好生活是人类生活理想在中国场域中的现实形态，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背景下，人民美好生活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命题，由此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内涵。就其理论内涵而言，美好生活有“需要说”（将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优美环境需要作为美好生活的基本内涵<sup>①</sup>）、“价值说”（认为价值实现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旨归<sup>②</sup>）、“本质说”（认为美好生活是与人的本质相一致的生活方式<sup>③</sup>）、“人类说”（认为美好生活在中国梦与世界梦之理想同构的境遇中推进着属于人类的共同理想生活<sup>④</sup>），等等。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人民美好生活的内涵解读涵盖了多种规定性，但大多在要素拆解中流于片面化和外延化，缺乏整体性和内生性的阐发。由此，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系统考量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对于更好地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深远意义。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当代社会主义重点研究基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大研究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SDZXWT01）、山东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化学理化学科化研究”（19RWZD01）的阶段成果。

① 参见王金磊、姚聪聪：《习近平关于人民美好生活重要论述的哲学意蕴》，《广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

② 参见刘吕红：《人民美好生活创造的逻辑理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9年第1期。

③ 参见张三元：《论美好生活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探讨》2018年第2期。

④ 参见项久雨：《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样态变革及价值引领》，《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1期。

## 一、美好生活生成的理论维度

布洛赫指出：“人们无时不在丰富多彩地梦想着更美好的、可能的生活。”<sup>①</sup>自人类意识觉醒以来，美好生活就成为人类世代相续的追求。但是，不同的时空条件造就了人民大众美好生活追求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一方面保留了人类一般性的美好生活追求，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美好生活追求的特殊性。同时，对于处于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个体而言，因生存环境、人生经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不同，其美好生活追求呈现个性化特征。可见，作为人民大众的话语表达，“美好生活”一词并没有固定的含义，其内涵被“私人化”。加之，现代生活场景为个体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生存空间、更加多面的角色、更加多元的价值选择，进一步丰富了美好生活的意涵。显然，作为大众话语，美好生活是指不同个体根据自身生存条件和发展方向对生活目标和生活内容产生的各种诉求，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个体性特征。

伴随人类美好生活追求实践内容的不断丰富，有关美好生活的理论反思和理论自觉开始出现，个体化的美好生活追求以各种思想体系和理论形态被载入人类文明的史册。一般而言，以美好生活为主题的思想体系构建发生在轴心时代<sup>②</sup>。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思想体系，将美好生活寄于“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中，描绘了一个国家管理有礼有序、社会风气仁爱团结、人民生活安居乐业的“大同”景象，沉淀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合基因的美好生活理念。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思想体系，以理性精神开启了人类美好生活的理想维度。苏格拉底强调知识对于生活的意义，认为“知识即美德”，国家交付于有知识的人才会获得光明前景；柏拉图肯定各司其职的秩序性，认为每个人都应选择一种最适合自身天性的职务，并做到“相互提供服务”；亚里士多德明确了人是政治动物的认知，将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诉诸城邦政治。与轴心时代思想家形成的有关美好生活追求的思想体系相比，空想社会主义者进一步针对美好生活追求进行了制度性尝试。始于莫尔，发展成熟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已涉及生产资料所有、分配方式、政治参与等美好生活制度性构建的核心内容，欧文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触及了美好生活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问题。但无论是轴心时代对美好生活的思想体系建构，还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乌托邦构想，都难掩其抽象性的缺陷。

直至科学社会主义诞生，这一抽象性才彻底被克服。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现实的人”蕴涵着美好生活生成的原初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sup>③</sup>。马克思恩格斯以摆脱了抽象性的“现实的人”结束了观念对人的统治。“现实的人”是指一定生产力条件下“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sup>④</sup>的所有人。所谓“有意识”，即超越意识，正是具有超越意识的生命活动使人区别于动物，使人不断超越现存并保持向上的生命态势，在实现由“生存”向“生活”跃升的基础上奔向更有意义的生活。换言之，超越性驱动下“现实的人”不

①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第1卷，梦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1页。

② “轴心时代”是卡尔·雅斯贝斯的著名命题。他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500年前后人类文化取得重大突破的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参见[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页。

不仅要生存，而且要生活；不仅要生活，而且要“按照美的规律”<sup>①</sup>生活。美好生活就是具有超越性的“现实的人”在拓展生命活动、改善生存状态过程中产生的生活样态。这里的“美好”二字不仅指“现实的人”的主观感受，更蕴藏着“现实的人”对当下不完满的生存状态的认知，是在超越现实基础上对生活展开的丰富想象。显然，美好生活总是处于开放发展的运动状态，它的每一个时间节点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个环节，呈现出辩证否定的时间结构，这一结构展现了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

作为“现实的人”的现实确证，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不仅是形式的生成，而且是内容的生成。具言之，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深植于“现实的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不断丰富过程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内在统一和深化拓展构成美好生活的空间结构。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脱离世俗世界和物质生产的“美好生活”，强调“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sup>②</sup>对于“现实的人”的生命存续和历史发展的前提性意义。离开物质生产，美好生活就失去了现实生成的客观支撑。另一方面，马克思在观照“现实的人”的精神属性中刻画了“现实的人”的真实形象。马克思认为，如果人的吃、喝、生殖等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sup>③</sup>，即“现实的人”不能一味沉迷于物欲满足而忽视其他生活领域，否则就会倒退至原始的动物冲动阶段。而精神生活则是“其他生活领域”的核心所在，人性的塑造发生在“现实的人”对精神生活的设计、追求、创造和完善中，“现实的人”以肉体生命为基础，追求高于肉体生命的意义世界。

美好生活的生成以“物质—精神”为基本要素，并不断趋向多元化，即从维持基本生存迈向注重生活体验和精神滋养，逐渐走向更高质量生活的阶段。这是因为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没有止境，美好生活没有“最美好”，只有“更美好”。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④</sup>为原则规定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视阈下人之理性所及的“最好的”生活，但它的实现绝不是一个静态的终点，而是一个包含着走向“更美好”生活内在动力的开放性生成。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现实的人”作为美好生活生成的逻辑起点和价值旨归，以其超越性催生了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性。从形式看，美好生活呈现出辩证否定的时间结构；从内容看，美好生活呈现出“物质—精神”基本要素不断深化拓展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有机结合构成了美好生活完整的历史生成性，这一历史生成性就是美好生活的本质规定。

由此观之，马克思恩格斯立足“现实的人”，以兼具形式和内容的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性克服了以往美好生活构想的抽象性，确立了美好生活的现实性和此岸性。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具有现实性的理论形式完成了对以往美好生活构想的批判性超越，那么，列宁则是以具有科学理论基础的实践形式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的实践转化。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美好生活的现实性和此岸性，在列宁那里通过真实有效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得以“落地”。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将“理论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实践的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为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提供了制度保障，能够助力“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的、最幸福的生活”<sup>⑤</sup>。总体而言，列宁的“实践的社会主义”颇具尝试性，是兼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和本国特色的历史性创造，以系统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为以中国为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⑤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46页。

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美好生活理念设计和实践探索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范式和现实参照。

## 二、美好生活生成的历史维度

正是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的科学指导，人民美好生活在中国场域中的历史生成得以丰富多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足百年的时间跨度并不算长，却能够提供窥见人类美好生活历史生成的窗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相继开启了中国历史新纪元，开辟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人民美好生活不断生成的历史画卷。

### 1. 新纪元：物质基础相对匮乏条件下人民精神生活中信仰要素的激励作用明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中国共产党先后通过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抗美援朝、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带领人民突破了国际困局，恢复了国民经济，初步建立起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令中国人民欢欣鼓舞，体会到作为国家主人的尊严和自豪感，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了切身的体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创造力充满信心。在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中，物质生活是美好生活生成的现实起点，但精神要素对物质生活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马克思深刻指明：“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sup>①</sup> 激情和热情能够激发人的劳动创造性，促使人们主动投入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种能够转化为物质力量的精神力量。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认知和切身体验，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作为内含着强烈情感和意志的精神要素被赋予崇高地位，在当时充分发挥了涵养精神世界、凝聚价值共识等方面的激励作用，因而能够在激发人民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基础上，极大地调动了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精神品质，在物质基础相对匮乏条件下点燃了人民的生活热情和希望，为物质生活的生产、积累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能。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人民的信仰要素在当时发挥了显著的激励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这一精神要素能够切断物质生活对生产力发展的依赖。从长远看，丰富人民物质生活、促进人民美好生活层级跃升的根本出路是生产力的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注民族解放和人民现实生活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人民美好生活理念，该理念涵盖了中国人民如何获得民族尊严、如何独立自主地进行美好家园建设等要义。作为美好家园建设基础的物质生活，其生产和丰富需要充分发挥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具体体制机制的交互作用。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并不充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尚未充分积累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sup>②</sup>。在向苏联学习过程中，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不仅帮助中国人民顺利度过了经济困难时期，而且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资金短缺的条件下将有限资源的作用最大化。

### 2. 新时期：物质生活丰裕基础上人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聚焦人民物质生活提升中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sup>③</sup> 由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重视人民的物质利益诉求，带领人民大力发展生产力，并确立了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激活人民的物质文化的创造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提供了体制机制条件，并在改革开放的实际进程中，形成了以发展生产力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内容的人民美好生活理念。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紧抓发展这一主线，将人民美好生活理念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中国发展和人民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张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借助发展和改革之力破解发展难题，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的人民美好生活理念。在以上人民美好生活理念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突破了人民物质生活贫乏的困境，人民的物质生活逐渐丰裕起来。

实际上，为防止人民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错位，中国共产党人在带领人民进行物质生活创造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人民精神生活的构建。邓小平一再强调：“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sup>①</sup> 江泽民高度重视人民的文化利益，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sup>②</sup> 胡锦涛也强调，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权益”<sup>③</sup>。在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的理念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关注人民生活的新变化、新要求，将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容逐渐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在改变社会生产落后、供给短缺局面的基础上，注重人民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协同发展，人民美好生活的物质文化内容趋向丰富化、立体化。但伴随着中国在融入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推进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更大发展空间的同时，全球资本逻辑的触角也更为广泛地伸入中国，中国社会随之产生了对物质的偏爱倾向。在此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建设投入不断加大，我国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问题随之显现；物质消费和物欲享受成为众多个体生活的重要动力，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心灵荒漠化”和“精神空心化”现象。在个体物质生活极大丰裕的同时，理想信念模糊等精神生活问题随之显现。

### 3. 新时代：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前提下拓展人民生活新样态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④</sup>。人民从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有无”上升到对其进行“好坏”评价，并在政治建设、社会环境、精神文化等多方面产生了日益增长的新诉求。以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回应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逐渐形成了涉及目标体系、内容要素、道路选择等多方面的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理念。就目标体系而言，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根本性目标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三大阶梯性目标体系相融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向同行。从“人民生活更加殷实”<sup>⑤</sup>到“人民生活更为宽裕”<sup>⑥</sup>，再到“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sup>⑦</sup>，人民的美好生活目标逐次升级。就内容要素而言，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不仅包括丰裕的物质条件和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67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③ 《胡锦涛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7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78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8页。

⑦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页。

充实的精神世界，还要求进一步实现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绿色美丽的生态环境，这契合了美好生活以“物质—精神”为基本要素的空间结构的开放性生成。就道路选择而言，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创造要求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这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sup>①</sup>，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特色创新之路。

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理念引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路，积极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人民的生活样态拓展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人民美好生活追求在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中走向深化。在新时代，人民对“绿水青山”的重要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知：更加认同绿色健康的生活理念，更加追求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更加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活体验。同时，人民精神生活诉求更加多元高质：人民渴望拥有更多休闲时间，渴望进行更高层次的学习进修，渴望拥有更加充实的精神世界。对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生态建设置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重要位置，更加注重发展的责任伦理，这一责任伦理既包括对当代人的责任，也包括对后代人的责任，是一种顾及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具有全球性与前瞻性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更加重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内在涵养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以及以道德修养、文化素质、价值观念为核心要素的个体精神家园的构建，在关注精神成长中为人民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领地。当然，新时代人民在生态环境、精神建设等方面的非物质性生活目标的实现，仍需要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继续发展生产力，以夯实人民美好生活之基，是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的客观要求。

### 三、美好生活生成的现实维度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历史维度，印证了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美好生活历史生成性的理论实质，揭示了美好生活的物质要素和精神要素不断深化拓展的规律性，与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理论维度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人民美好生活的实践生成。这是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在中国的理论推进和创新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历史延展和实践要旨。对此进行理性审思，坚定理论指导，汲取历史经验，获取实践智慧，有助于寻求科学的现实进路，推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持续提升。

#### 1. 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坚守其初心使命过程中持续提升

纵观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发挥着政党的主体引领作用。人民美好生活的历史生成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内涵着规律性要求的“事在人为”的过程，这决定了人们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发现、认识和利用美好生活生成的规律性。由此，先进力量的主体引领便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重要条件，中国共产党以其人民性无可置疑地成为人民美好生活的引领者。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追求人民幸福，在坚持人民立场、维护人民利益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执政价值，人民性由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内在规定。作为一个除了人民利益别无他利关切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将其初心使命贯穿落实在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人民需要的及时回应，巩固强化了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这是中国共产党“能”成为人民美好生活引领者的客观前提。

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对其初心使命的坚守与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演进具有内在契合性，是同一

<sup>①</sup>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9页。

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就生成于中国共产党追求“人民幸福、民族复兴”的目标过程中。在人民性的价值追求和制度规制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①</sup>的初心和使命。所谓“坚守”必然蕴涵着“不变”的规定性，即人民性。同时，坚持人民性本身还内涵着变化着的具体内容，因为人民的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性，就要根据人民所处的时代特点和人民需要的具体变化来调整现实的执政逻辑。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又有着“变”的规定性。可见，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中蕴藏的“变”与“不变”的规定性，将人民需要层次升级产生的作用力与人民性规制下中国共产党坚守初心使命产生的作用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良性互动机制，协同推动了人民美好生活的演进。

在新时代，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守其初心使命过程中持续提升，需要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引领，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下，使人民获得前所未有的整合力、凝聚力和发展力，使人民克服自身生活自发性、无序性的风险，确保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连续性，助力人民生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坚守其初心使命，不仅要牢记“初心和使命是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竭动力”<sup>②</sup>，而且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坚持不懈锤炼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sup>③</sup>，力求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彰显中国共产党对其初心使命的坚守，不仅要时刻坚持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全党、团结人民，而且要借助自我革命进行先进性建设，不断提高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其在人民美好生活生成中的引领力、组织力和号召力，确保党和人民能够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继续团结带领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 2. 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中持续提升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理论逻辑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美好生活层级性的历史生成，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人民美好生活的保障作用。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打开了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的全新思路，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中国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正确打开方式。社会主义制度自身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客观力量，只有依靠具体的体制机制和治理体系才能实现美好生活理念向现实的转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建立、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了涉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制度等多个方面的制度体系，推进并深化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人民深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深化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自然规律等具体规律的认知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全国一盘棋等制度优势，正是这些制度优势保障了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生成。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影响人民美好生活生成最为直接的制度要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最具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恩格斯曾指出，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sup>④</sup>。但中国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页。

②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人民日报》2020年1月1日。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96页。

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坚持社会主义底色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相结合，极大提高了生产力的活跃度。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sup>①</sup>。客观而言，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是一个动态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永逸。因此，在新时代境遇下，我们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续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坚定制度自信，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显著优势，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治理效能，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持续跃迁提供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

### 3. 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在现实维度与理想维度的张力保持中持续提升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蕴藏着现实维度与理想维度的张力，这一张力正是人民美好生活辩证超越的发生机制。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中，人类生活在人的超越性驱动下不断演进，而这种超越性是在现实维度与理想维度的互动中实现的。在人类生活历史生成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不可分割且保持着张力，在这一张力驱动下，人类实现自我超越，人类历史得以不断生成。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理想不同于空想，它来源于过去，植根于现实，而又面向未来。在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演进中，人民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超越冲动和对理想的渴望追求，并确保理想维度与现实维度之间的张力。确切而言，这一张力源于两个方向：一是纵向的，人们在获得比以前更美好的生活后，会逐渐将这种生活常态化，进而产生更进一步的美好生活诉求；二是横向的，人们不仅要针对自身生活进行今昔对比，而且要与同一时空下的“他者”生活进行对比，在与“他者”生活的比较中，发现自身生活的“不美好”，进而追求新的“美好”。但无论是来自纵向还是横向的驱动力，都应符合生产力发展规律和人民自身生活实际，否则易产生急功近利、奢侈攀比的不良社会风气。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作为特定生产力条件下“现实的人”的生活目标，同样内涵着理想与现实两个维度。作为现实维度的生活，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强调人民需要得到满足后获得的愉悦感，注重人民的当下体验。作为理想维度的生活，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指向人民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突出人民生活的超前预期。因此，要推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持续提升，一方面，要高度重视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现实维度，加强对人民现实生活的反思，发现人民生活存在的普遍问题，探索提高人民美好生活感受力的具体路径，特别是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sup>②</sup>。另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想维度。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一幅能够唤醒人民生活热情的理想图景，该理想图景使人民成为创造主体，能促使人民朝着预定的美好生活目标奋斗，提高人民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物质生活内容吸引力降低、人民生活样态不断深化拓展的新时代，深掘人民美好生活的理想维度意义深远。

### 4. 推动人民美好生活在历史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的统一中持续提升

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严格遵循了人民历史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相统一的规律，孕育了共创共享的实现样式。一方面，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是基于人民历史主体性的“共创”。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要创造历史，就要从事劳动。“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8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页。



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sup>①</sup> 人类历史发展至今，劳动不再仅仅是维持人的肉体存在的手段，更多地发展为一种创造性劳动，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美好生活是干出来的，没有人民的创造性劳动，人的超越性将失去对象化的实践力量，人民美好生活也将失去物质支撑。因此，要实现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愿景，并推动其持续生成，就要继续发挥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创造性，“让全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释放创造潜能，通过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sup>②</sup>。但是，当前社会存在着慵懒风、懈怠风、速成风等蔑视劳动创造的不良社会风气，使得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例如，“网红直播”“明星真人秀”等产生的经济效益冲击了劳动至上的价值观，使得一些人沉迷于一夜暴富的“美梦”。对此，我们要突出劳动价值，“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sup>③</sup>，批判不劳而获的生活幻想，鼓励人民弘扬奋斗精神，并通过制度设计创造良好的劳动环境和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一方面，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是基于人民价值主体性的“共享”。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劳动人民实现了生活水平的跃升和生活样态的演进，全体劳动人民理应成为美好生活的享有者。习近平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sup>④</sup> 共享美好生活的成果，要求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并使全体人民在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人民美好生活生成演进中，人民美好生活诉求从以物质为主的要素构建向以物质、精神等要素协同构建转变，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来源也发生了结构性变革，转向以经济为基础，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共同发挥作用的复合性来源。在新时代，要在共享发展成果的过程中不断提升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就要在保证人民物质生活基础上，不断满足人民多样化的发展和休闲等需要。与此同时，不断加快对贫困群众、弱势群体的政策倾斜和扶持，促使他们尽快脱贫致富，并充分发挥精神扶贫的可持续性效能，努力实现人民总体享有向人民全面享有转变，做到全体人民在共享美好生活成果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sup>⑤</sup>。

综上，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逻辑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三个维度的系统考量中得到立体化呈现：从个体化的美好生活追求，到体系化的美好生活思想构建，再到马克思主义美好生活理论完成对以往美好生活构想抽象性的超越，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理论逻辑得以厘定；从物质基础相对匮乏条件下人民精神生活中信仰要素的激励作用明显，到物质生活丰裕基础上人民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再到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并重前提下拓展人民生活新样态，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历史逻辑得以明晰；从政党力量的主体引领、制度优势的有力保障、批判超越的发生机制、共创共享的实现样式四个方面切入，通过中国共产党对初心使命的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持和完善、现实维度与理想维度张力的保持、历史主体性与价值主体性的统一等，不断推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持续提升，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现实逻辑得以彰显。由此观之，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是在理论、历史与现实三个维度的交互作用中生成的，有着完整的逻辑体系。藉此，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的生成成为一种符合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的客观趋势，正是这一客观趋势赋予了党和人民在新时代境遇中战胜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强大内驱力。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下转第104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6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00页。

⑤ 参见张岩：《习近平心中哪些人“一个也不能少”》，[http://china.chinadaily.com.cn/2016-08/01/content\\_26297894.htm](http://china.chinadaily.com.cn/2016-08/01/content_26297894.htm)。

会民主党的“青年派”在分配正义问题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错误而展开的批评。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能走出分配领域的局限，直指所有制关系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实质正义的。恩格斯发现，分配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反映，但这种社会关系是在生产领域被创造出来的，这也正是为什么“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同时出现的原因。可见，像马克思一样，恩格斯把社会关系定位于生产领域，坚持认为生产正义决定分配正义，生产方式才是资本主义社会正义问题的本质规定。

在对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学术关系的判断中，卡弗认为恩格斯离开了马克思的思想活动：“马克思的推断被恩格斯含蓄地加以重新定义，诠释范畴被强加于其著作，对方法的强调超过了内容。”<sup>①</sup>但是，通过梳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贡献，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思想上具有一致性，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独特的贡献。从这个角度上看，纪念恩格斯，捍卫恩格斯，正确评价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史上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恩格斯的伟大贡献，关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

#### 参考文献：

- [1] 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
- [2] 张文喜：《马克思对“伦理的正义”概念的批判》，《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 [3] 仰海峰：《〈资本论〉的哲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4] 邓莉：《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导读》，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

（编辑：刘曙辉）

（上接第52页）情的发生，不可避免地对人民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但历史地、辩证地来看，这些冲击仍是暂时的，因为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生成的大逻辑、大趋势不会改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不会中断。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将会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绩效中持续提升，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参考文献：

- [1] 张三元：《论美好生活的价值逻辑与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
- [2] 王永章：《马克思劳动幸福观的三个层次》，《思想理论教育》2019年第9期。
- [3] 李磊：《习近平的美好生活观论析》，《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1期。
- [4] 王岩、秦志龙：《满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红旗文稿》2019年第18期。
- [5] 袁祖社：《公共价值的信念与美好生活的理想——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理论深蕴》，《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12期。

（编辑：刘曙辉）

<sup>①</sup> [美]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